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UHK

中国哲学与文化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第十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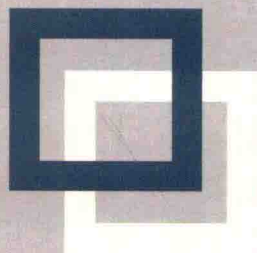
NO.16

汉学、哲学与比较——方法论争议

Sinology, Philosophy, and Comparison——Debates over Methodology

郑宗义 主编

Editor Cheng Chung-y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UHK

中国哲学与文化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第十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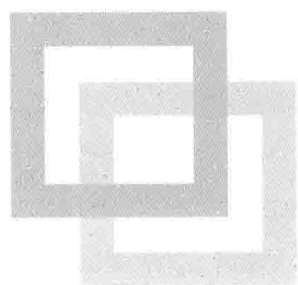
NO.16

汉学、哲学与比较——方法论争议

Sinology, Philosophy, and Comparison——Debates over Methodology

郑宗义 主编

Editor Cheng Chung-y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与文化. 第十六辑, 汉学、哲学与比较:
方法论争议 / 郑宗义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325-9033-9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1805 号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六辑)

汉学、哲学与比较——方法论争议

郑宗义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033-9

B·1074 定价: 6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中国哲学与文化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学术顾问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列)

余英时 (Yu Ying-shih) 杜维明 (Tu Wei-ming) Donald J. Munro (孟旦)

主编 **Editor**

郑宗义 (Cheng Chung-yi)

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

姚治华 (Yao Zhihua)

编辑委员会 **Members of Editorial Committee**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列)

王德有 (Wang Deyou)	Chris Fraser (方克涛)	Rudolf G. Wagner (瓦格纳)
冯耀明 (Fung Yiu-ming)	Philip J. Ivanhoe (艾文贺)	Stephen C. Angle (安靖如)
朱鸿林 (Chu Hung-lam)	庄锦章 (Chong Kim-chong)	刘笑敢 (Liu Xiaogan)
李明辉 (Lee Ming-huei)	李晨阳 (Li Chenyang)	杨儒宾 (Yang Rur-bin)
陈来 (Chen Lai)	陈少明 (Chen Shaoming)	林镇国 (Lin Chen-kuo)
信广来 (Shun Kwong-loi)	黄慧英 (Wong Wai-ying)	颜世安 (Yan Shi'an)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曾诵诗 (Esther Tsang)

编务 **Editorial Assistant**

李宁君 (Jessica Li)

通讯编辑 **Corresponding Editors** (按中文姓氏笔画排列)

陶乃韩 (Tao Naihan) 梁涛 (Liang Tao)

主办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冯景禧楼G26B室

Room G26B, Fung King Hey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电话 Tel: 852-3943-8524

传真 Fax: 852-2603-7854

电邮 E-mail: recpc@cuhk.edu.hk

网址 Website: <http://phil.arts.cuhk.edu.hk/recpc>

—目录—

主题论文：汉学、哲学与比较——方法论争议

心斋坐忘：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戴卡琳(Carine Defoort)著,傅扬、陈志强、王晓薇合译 1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梅丽(Mercedes Valmisa)著,邝隽文译 20

比较时代的哲学研究必须超越“以中解中”

李晨阳 51

专 论

“父子互隐”的心理诠释

岑溢成 62

“理事不二”和“理一分殊”两种思维模式的起源

袁承维 88

新叶林

A Symmetrical Approach to Reading the “Cheng” Chapter
of the *Huangdi Sijing* 以平行对称的思考模式解读

《黄帝四经·称》

Ang Wei Yang(洪维阳) 119

专题研讨：汉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

近几年来大陆地区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郭齐勇 144

台湾中国哲学研究的现况

杨祖汉 156

香港的汉语中国哲学研究

郑宗义 168

编后语

汉学、哲学与比较——方法论争议

郑宗义 173

稿 约

心斋坐忘：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戴卡琳(Carine Defoort)著 傅扬、陈志强、王晓薇合译^{**}

内容提要：本文受《庄子·人间世》一段对话的启发，辨析学术论辩中三个相互紧扣的层次：顶层是“知识”的论争，包括事实、理论、假设，等等；下一层是“情感”，这个层面虽然鲜为人所留意，却颇有影响力；底层则是“虚”。本文以为，倘若学术界可更明确地接受下面的两层，更用心地欣赏当中细致的情感，更坦然地承认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无知，中国哲学的研究当有更长足的进步。为了解释上述的三个层次——确证、情感、无知——本文将详细分析刘笑敢2015年对朴仙镜(Esther Klein)2010年一篇关于《庄子》的论文的回答。讨论重点并非这两位学者，而是他们所显示的一个学界普遍现象。

关键词：《庄子》，内篇，有知之无知，刘笑敢，朴仙镜(Esther Klein)

引言：锻炼心斋

请容我以这样的呼吁作为开场白：在会议期间，让我们尝试斋戒三天吧。第一天，禁甜食；第二天，只茹素；第三天，连水果和蔬菜都不吃；到了第四天——这点很重要——回归正常饮食，取我所喜。由于晚宴和茶聚通常是会议期间最为学者热爱的部分，我务必解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古怪的方案。就我个人经验，偶尔戒食是相当有益健康的锻炼，它让我在回归正常饮食时，可以更好地觉察各种滋

^{*} 本文初稿以“Mental Fasting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Liu Xiaogan versus Esther Klein”为题，首先于“首届欧洲中国哲学学会双年会”(立陶宛，维尔纽斯，2016年6月9日)宣读，后于 *Problemos* 发表(2017.1: 9-23)。本文以上述论文为基础修改翻译而成。

^{**} 戴卡琳，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电邮: carine.defoort@kuleuven.be)；傅扬，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电邮: fuyangrs@gmail.com)；陈志强，台湾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电邮: ckchan@ntu.edu.tw)；王晓薇，鲁汶大学汉学系博士(电邮: abigail_wang@hotmail.com)。

味的微妙处。但基于各种原因,戒食也可能相当困难,这些原因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或以为我们必需特定食物以维生的信念;甚或因为我们有时不能完全确定什么算水果和蔬菜。再者,我并不确知戒食究竟能带来什么益处,也不知它是否对其他人也一样有效。是故,戒食三日的呼吁纯粹是个建议,愿者上钩。

不过,由于我们参与的是首届欧洲中国哲学学会的双年会,这项锻炼或可稍作调整,以“心斋”代之:第一天,抛下所有现代的新词汇和西方哲学术语;第二天,避免使用佛教和理学的概念;第三天,尝试将所有汉代以降的术语置而不论;到了最后一天——重申,这点很重要——我们回归正常,随心所欲运用任何我们认为有助于诠释古代中国文本的语言与概念。因此,本文并非倡议避免使用外来或时代错置的概念,进而返归一种据称是原初的中国思想形态^①。尽管我无法预测其他人对此锻炼的回应,它确实让我以更开放的心灵体察古代文本的精致细微处,并拥抱别开生面的解读。但这个锻炼也殊非易事:因学界积习难返,我们久已惯于通过后来概念来解读传统中国思想,以至我们很容易混淆古今,分不清两者之间的界线。

本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根据《庄子·人间世》仲尼与颜回的一段对话,辨析“知识”、“情感”、“无知”三大学术分歧,并藉此具象化一种阅读先秦经典的方法论。第二部分随即具体应用这个见解,以考察刘笑敢对朴仙镜(Esther Klein)论文^②的回应——一个刚巧亦关于《庄子》的具体学术争议。这个个案研究提醒我们去关注学术争论中间层面的情绪,其上是非把事情确定下来不可的偏执态度,其下则是承认有所不知亦无不可的谦逊态度。是故,《庄子》在本文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启发了一种方法论的形成,也同时是应用这种方法论的平台。但我并不会在本文中对《庄子》其文展开新的诠释或进

① 重现这一原初的思想形态,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见 Carine Defoort,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s on Chinese Philosophy: Editor’s Introduc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30.4 (1999): 4–8。

② 见 Esther Klein, “Were There ‘Inner Chap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A New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about the *Zhuangzi*,” *T’oung Pao* 96 (2010): 299–369(刊物页首误植为2011年出版);以及 Xiaogan Liu, *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 (Dordrecht: Springer, 2015),特别是他自己在第二部分“《庄子》”的数篇文章(页129–237)。

行历史信息的补充^③。

一、认知、情感与虚空：“有知之无知” (Informed Ignorance)的诠释学

《庄子·人间世》开首是仲尼与颜回的一段对话，其时颜回正在准备前赴卫国实现政治抱负。孔子提醒颜回教训他人的风险，尤其当对象是卫君这样的“暴君”时；颜回应“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否则“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孔子亦指出“知出乎争”，不宜称美。他进而建议学生实践“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所谓“气”，是“虚而待物”；而所谓“虚”，就是“心斋”，即心灵的清空。这种“无听之以耳”的忠告，就好比“无翼而飞”或“不触地而行”般不易实践。毕竟世人都只闻说以“有知”的方式获得知识，但从来未闻以“无知”的方式反而更能获得知识（“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事实上，实践“心斋”可以获得非笔墨能形容却又意想不到的回报：“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④

上文简述了《庄子》一段被翻译讨论已久的著名对话。我于此无意置喙，亦无意自称可以为孔子的建议提供一个更好的诠释。我只是希望借用它的结构，来辨别学术争论中的三个层次：尽管学术争论通常发生在“知识”的层面（见本段第一小节），但其实尚有“情感”这个更为深层、却又鲜为人所肯定和注目的层面。本文并不想把学术论争简单理解为意气用事，但确实想要积极关注学术论争中的情感基础（见本段第二小节）。想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一步，则是承认我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个更深层的，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关系（见本段第三小节）。

（一）认知与争论

宽泛地说，学术讨论通常和知识有关：事实、诠释、假说，以及理

^③ 《庄子》作者及编者的统一性和真实性，是本文第二部分个案研究中的辩论主题，但不影响我从方法论角度利用《庄子》文本。

^④ 刘殿爵、何志华、陈方正编：《庄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页8—10。

论等。争论和异议使学术讨论更见蓬勃。如在中国哲学领域,庄子曾被假定为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原始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许多学术著述由焉而生。即便歧见有时可能相当尖锐,学术交流通常还是有意义,且相对来说令人满意的,因为持异议者仍属于相同的学科,共享不少假设和概念。哲学家也可以和其他学科互动,就一部典籍的作者或以之命名的那个人,讨论其年代和来源:庄周(约公元前370—290)之于《庄子》即为一例。只要历史持续扮演附属的角色——作为哲学的婢女(*ancilla philosophiae*)——追寻诸子创建哲学、与人争辩、成立派系的种种讯息,这种着眼于事实与诠释的争论依然饶富意义。尽管有歧见,学术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一种相对共有的基础上。

然而,一旦历史从婢女提升到与哲学同等的地位,便有动摇哲学构筑与争论本质的风险。我们从历史或考古科系获得的讯息提醒我们,对于战国时代,吾人所确知的东西极端稀少。举例来说,晚近的出土文献研究显示(并印证了早前宣称),通常后世所假定的“书”“作者”“学派”“标题”“学说”等概念,在那个时代可能是不尽明朗、并不存在,或正缓慢地浮现。反过头来,这些信息又显示出,许多我们现有的认识,都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并且是在各种诠释框架中慢慢成形的;随时间递移,这些诠释全部都被归到了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客体上。由于这类历史研究通常对早期诸子文本的哲学诠释赖以形成的前置条件提出质疑,它时常被视为威胁。尽管研究中的较高层面——讨论假说和验证资料——毋庸置疑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且具支配性的部分,本文将转向研究中极易被忽视的较低层面。

(二) 情绪的层面

就学术讨论来说,如果那些通常作为讨论基础的假设受到了质疑,那么这种质疑要比明确的反驳论调更难处理。对此不同的反应可能是: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尝试敷衍处理若干史学发现,另一些人完全忽视来自其他学科的挑战(例如举办只有同行出席并闭门贬斥他人的会议),还有一些学者则将棘手的观点全改写为自己的解释。此中错综复杂的诸种反应,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首先,哲学家已经使用了很多不同方式,尝试应对与吸纳来自历

史学家、考古学家、考据学家和汉学家的观点。这些尝试常常促进人们在方法论上进行反思：即如何看待即便文本是由多人撰写、屡经修订、年代古老、久经传世、晚近出土，甚至文字脱谬，却仍旧受到融贯一致的考量。即便有时会采纳其他学科的诠释，哲学家们仍旧认为，在对作者身份、文本增衍、编纂史以及不同子书的思想归属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一种哲学式的阅读仍然可以有其合理性。他们认为，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每个文本都作为整体受到其受众的解读；而所有这些解读又会构成一个更大的话语体系，可以说时至今日，我们都仍参与在这个话语体系当中。这种对于“非哲学”讯息的“哲学式”回应，既合理亦有效；然而这种回应却并不认为这些可能阻碍结论生成的讯息本身可以提供哲学的灵感。它们充其量只会被认为是对文本建立真正哲学式阅读之前，一些有待清理的小障碍——而且通常只会在引言或注脚中被提及。有别于这类回应，在稍后说明方法论的第三个层次时，我将会尝试唤醒大家：意识到我们知之甚少，本身即是一种哲学灵感的来源。

第二种处理这些可能会动摇我们研究的讯息的方法，是对之全然漠视。即使这种态度有违我们致力使学术得以普遍及科学的期望，在学术研究中，一定程度上的固执己见是正常甚至合理的。在库恩(Thomas Kuhn)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⑤后的几十年间，这种现象引起了大量讨论：出于对典范与一系列基本假设的依赖，研究者不会因为明显令人不安的事实，而全然牺牲其基本论述。反之，他们总会建立将就应付的假说，继续维护自己的理论。他们有意无意都会接受一定程度上的“理论致盲”(“theory-induced blindness”) ^⑥。例如针对诸子百家中的残篇与屡经编订的材料，古今学者都想方设法建立一套套言之成理的叙述。除了学者们在所处地域和时代上的差异以外，每位学者又在个人风格、喜爱的话题、思考材料的方式、乃至仰慕的学

⑤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⑥ 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对这种盲目的复杂性有所反思，并将之归诸于某种情绪性依附：“一旦你接受一个理论，并在思考时以之为工具，要注意到其缺陷是极其困难的……你会对该理论采姑且信之的态度，信任同样接受它的专家群体。”见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London: Penguin, 2012), p.277。

术模范上有所不同。此外,众多学科的存在及它们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为我们提供了稳定收入、学术网络、见识机会(透过会议)、精神满足,以及个人自尊。所有这样的知识、社会、情感理由,都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学术的偏见。就算这些偏见有时候可以得到改正,我相信我们更能受益于自觉的观察、肯认、描述,甚至自行探索属于我们自己取径的特点。这种自觉具有双重好处:一方面,我们可以增加对其他学者个人特点的包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自己思维的僵化。

对于来自其他学科的冲击,以上两种哲学家的回应都是可以接受的。相较而言,第三种回应则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驱动这种回应的往往是不被察觉的情绪。诚然,哲学著作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例如诸子的历史面貌、思想的一致性、文字的本义、与后来命名典籍的统一性、各家的隶属关系、篇章标题的可信度等。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都可以提出种种质疑。而由于这些质疑可能动摇到哲学著作的基石,哲学家有情绪反应是很正常的。不过,若不对这些情绪进行充分反省,则会导致不良后果:一则会倾向于将反方不确定的措辞改写为绝对确定的宣称,这也是学术论争在较高层面上学者们的预设态度,也就是所谓的“知出乎争”。诸子、学派、典籍、作者的存在,又或文本的断代等,原本明知尚是存疑的,但都可以自信却错误地断定其不存在。然究诸其实,在哲学诠释中缺乏某种证据,并不代表其必然不存在。其次,不被察觉的情绪也会导致另一种相关的不幸结果,即复杂的见解有被化约为简单二分的风险:“支持”或“反对”特定观点、“信”古或“疑”古、有时甚至被表达为对古代诸子或整个中国学术传统的“敬”与“不敬”。最极端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质疑都会被想象为反对中国传统的抨击。反过头来,考古学发现的断简残编,却又被当作特定典籍有其完整性的积极证据,甚至被作为可支撑现有认识的证据,且不再多作质疑。这些新的讯息一旦被硬套到这种简单二分的框架上,我们便很难再注意到那些与阐释不符的事实,文本中细微的差异,以及那些难以解答的不确定信息。即使作出“释”古的尝试^⑦,最后仍难免落入

^⑦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世界日报》1935年5月14日。

窠臼。是什么使得这种模式一再出现？依我所见，则应归咎于那些未被察觉的情绪；而更深层者，则是对缺乏一种对“有所不知”的正面态度。

（三）“虚”的潜力

意识到垫脚石的打滑有时只是一瞬间的事，这难免令人兴奋，毕竟向来以为确定的事情都暂时受到动摇。谁又知道“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庄子·则阳》）的道理？这就如同一个人要踏石过河时才发觉石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人仍旧只能靠这石头过河，哪怕他不得不应对将要感受到的震撼、晕眩、警惕与不稳。如《庄子·则阳》曰：“已乎！已乎！且无所逃。”^⑧作者似乎甚为享受这种不稳的体验。而唯有那些有过相同体验的读者，才会因《庄子》对这种体验的表述而欣赏它。一旦意识到构筑认知的根基从根源上就不牢固，便会意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有序的世界完全可以被塑造成（“形”）另一形态。在此之下，又存在着一个颇具威胁却同时很有解放意义的“未形”的现实，又可以被称之为“空”“弱”“容”或者是“虚”，它那不牢固的本质让我们永远无法妄下定论。

那些能够动摇古代中国哲学的主流论述的讯息恰好提醒我们，吾人对战国时代仍旧知之甚少，为了还原那个时代本来的面貌，历史上那些不断出现的阐释者们不得不去填补知识的空白。而一个完全成形的理想的哲学图景，则能具体追溯到20世纪。尽管为主流论述做出辩护和巩固的学术尝试是完全合理的，但偶尔对这些论述之下“未形的现实”的关注，在哲学上同样令人兴奋。根据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思考”就像风一样，可以“解开与融化那些被冻结为文字的想法（包括概念、句子、定义、教条）——而语言本应作为思考媒介而存在”；她指出，这无可避免地对“冻结的想法”产生破坏与动摇的效果^⑨。但这个意义的思考、融化、不知，不仅不是懒于认知，反而在知性上充满挑战。“存疑是很困难的。”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⑧ 刘殿爵、何志华、陈方正编：《庄子逐字索引》，页75。

⑨ Hannah Arendt, *Thinking*,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78), pp.174-175.

在描述如何抵挡理论致盲的诱惑时这么说道^⑩。除了一往直前致力于哲学建构,我们也可以偶尔回头凝望虚实杂陈的迷雾,质疑哲学建构所仰赖的基本概念。我深信这项锻炼在哲学上是令人兴奋的。这不仅是信广来所言,在文本分析与哲学建构之间“来回想象”的阐释层次,更是使诠释中众多层次益发分明的努力^⑪。学术上的“心斋”让我们主动培养不知的态度,对自己的基本叙述时刻保持怀疑与叩问。

1. 不知与知识

这种不知并非纯粹无知;相反地,它和知识在许多方面息息相关:

第一,心斋与我们自认已知的知识有正面的关联。现下我们对于出土文献、篇章标题、历史事件、诸子形象,以及现存汉代(或之前)版本的典籍,都自以为有明确的认识。但事实上,出土材料多半不以完整著述的方式出现,而且往往缺乏标题或明显学派归属。这些充斥着不确定的讯息彰显出了原始材料“未形”的本质,而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只会逐渐加深^⑫。

第二,对于诸子典籍中零散知识的认知,让人们对建立一系列不断发展的范式饶有兴趣,而这些范式则总体上构成了人们对诸子的认识。例如司马迁就将诸子呈现为不同的“作者”^⑬,冯友兰将他们化作“哲学家”^⑭。更具体地说,诸如郭象、成玄英、葛瑞汉(A. C. Graham)等学

^⑩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p.277. 关于心斋或坐忘中的这个主动过程,见 Livia Kohn, “Forget or Not Forget? The Neurophysiology of Zuowang,” in Livia Kohn, ed., *New Visions of the Zhuangzi* (St. Petersburg: Three Pines Press, 2015), pp.167–179, 特别是页 175–176。

^⑪ 这和信广来的用意有所差别。他企图“最小化我们当下的关怀与概念,对理解过去时产生的影响”,以至于解放随之而生、带有偏见的哲学建构。见 Shun Kwong-loi, “Studying Confucian and Comparative Ethics: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6.3 (2009): 455–478; 引用处见页 459。

^⑫ 关于标题,可参考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 页 7—9, 48—50。亦见 William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50–78; Mark Csikszentmihalyi and Michael Nylan, “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89 (2003): 59–99。

^⑬ 见 Martin Kern, “The ‘Masters’ in the *Shiji*,” *T'oung Pao* 101: 4–5 (2015): 335–362。

^⑭ 冯友兰是哲学典范的早期发展中最著名的代表,但不是最早的一员。见 John Makeham, “The Role of Masters Studies in the Early 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John Makeham, ed., *Learning to Emulate the 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73–102。

者研读《庄子》时，也对“作品”与几条“诠释”主线的确立颇有兴趣。因此，历史讯息既是积极的不知的起因，也是其结果。

第三，当我们着眼于个人叙述的偶然性时，非哲学资讯之丰富将在哲学上变得更为有趣。正如阿伦特可以对西方哲学的本质施以具历史感的反省，我们也可以通过战国诸子的研究不断探索自己思考方式的基础。

第四，适当砍伐思想上的杂木，新资讯才能如树苗般在清整过的林地上茂盛成长^⑮。甚至只要稍为减少僵化我们哲学叙述的东西，新颖的阅读便会产生。内七篇不是《庄子》最久远和最真实篇章的可能性——此即下节将讨论朴仙镜的主张——即提供我们带着崭新的心态重读其书的理由。事实上，这种经验的确指引了我近年大部分的《墨子》研究^⑯。

2. 不知与态度

积极接受不知的另一个效果——甚至比上述四类知识更重要——是对学术态度的可能影响。这种影响同样可以归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惊奇。认为内篇可能是《庄子》全书中最为晚成部分的想法，也许使人不安、困扰，但这也同时使人感到振奋、释然。当我们找到充分理由不再囿于一种相对僵固的叙述，一种知性上的愉悦自会油然而生。众多领域之中，哲学尤其崇尚这种惊奇的知性经验：哲学不仅训练学者根据学科的规则做研究，还不时要他们挑战这些规则，如术语、假设、概念等。

其次是谦卑。谦卑也是“虚”的一个意涵，源自对不确定的意识。试探性的见解可予重视，怀疑也不仅是确定思想的一时干扰。因此，学界存在着不仅是“知出乎争”的层面：学者在学界中的地位，不能取决于有否提出确凿无误的主张。

第三是宽容。面对质疑时，应当保留某种程度的柔弱与韧性，不

^⑮ 这是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解释“无”的方式(毋论好坏):“一大群人在一片森林干活,砍树伐木,为一片土地清除树木。”见 Léon Wieger, *Chinese Characters: Their Origin, Etymology, History, Classification and Signification* (Taipei: Lucky Book, 1984 [1915]), p.36。

^⑯ 这个体会在我近期多数研究中产生引导作用,如《古代的墨学,现代的建构: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5卷3期(2015年9月),页123—140。

必将质疑都定性为对立的主张。当我们意识到怀疑的瞬间,这种怀疑或会影响我们对于某一课题的知识,但未必能够取而代之。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继续持守自己的基本叙述,其他学者亦然。

第四是自反。无论我们研究什么课题——不论是苏格拉底、庄子或龙树——我们都是从事自我叩问的活动。自我认识永远是个有待完成的课题。

通过以上对于概念预设与个人态度的反省,我认为研究诸子典籍可为我们带来一点改变,使我们对同事、学生、亲人、朋友都更为细心宽容。这不仅因为诸子典籍中渗透着深刻甚或道德的内容,更是因为我们在方法论上接纳了一定程度的不知。然而,这种态度的改变并不来自对怀疑作纯理论上的接受,甚至不能依靠将这种理论转化为个人态度的坚定决心。我在这里试图捍卫的信念及其相应的学术态度,是一种生理状态和身体经验。此亦呼应孔子所倡:“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二、个案研究:刘笑敢对朴仙镜的回应

将方法论的反思暂置勿论,让我们转向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检视不久前两名《庄子》专家——朴仙镜和刘笑敢——的学术交流。朴仙镜是位年轻学者,于2010年在《通报》上刊载了一篇有份量的论文:“Were There ‘Inner Chap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A New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about the *Zhuangzi*”(《战国时代有〈内篇〉吗?有关〈庄子〉证据的新考察》)。在这篇论文中,她质疑《庄子·内篇》在编年上的优先性(即早于《外篇》、《杂篇》),以及其他涉及《内篇》内在融贯性、作者,及其在战国时期的存佚与地位等相关假设。这些宣称会令人不安,因为许多关于《庄子》的哲学研究,至少会将《内篇》归诸于一位原创性哲学家,而非如朴仙镜般仅视为文本话语中的“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⑩。

^⑩ 如朴仙镜所述,“作者功能的创造,是‘我们处理文本的方式’的一个近乎无法避免的结果(在此,“我们”也许可以扩大至既涵盖传统中国作者,也包括现代西方作者)”。见 Esther Klein, “Were There ‘Inner Chap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A New (转下页注)

另一位学者刘笑敢,自博士研究^⑩阶段开始,已是我们这个世代一位重要的《庄子》权威,近期编撰了 *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 (《道的哲学指南:道家篇》,2015),里面有一个内容丰富、有关《庄子》的部分,当中包含了他自己的研究。我不拟参与或单纯重复两位学者的辩论,而是想利用刘笑敢对于朴仙镜的回应,阐发前述的方法论反思。知识的争论本身固然引人注目,但争论的背后其实依附着一些情感诉求,包括塑造知识的深层信念(见本段第一小节),以及对于未知者的具体态度(见本段第二小节)。有时候学者之间未能适切交流,正是由于这些底下的层面备受忽略。

(一) 从事实到情绪

在知识的层次——包括事实讯息和假说——不管是《庄子》及其文本流衍的历史,还是相关的研究著述、考古发现和思想史,刘、朴二人的渊博都令人印象深刻。朴仙镜质疑《内篇》较早成书的证据是,有别于《外篇》或《杂篇》,出土或西汉晚期以前的传世文献中,从未有直接征引《内篇》的例子。除了以他命名的《庄子》外,没有很多早期文献材料能证实庄子本人的历史存在。其它传世或同时代的出土文献,也无法直截了当地肯定《内篇》的存在或其重要性。凡此种种,说明《内篇》很可能不是《庄子》最早的组成部分,在战国时期不是具内在融贯性的一个整体,更不用说不是道家哲学的经典^⑪。但考虑到我们关于战国时期的知识极度有限,这些质疑并不足以令我们充满自信地否定现时的主流描述。当然,更早时期引述《内篇》的材料都佚失了,或早期材料(如《吕氏春秋》)中与《内篇》重叠的内容,事实上

(接上页注)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about the *Zhuangzi*,” *T'oung Pao* 96 (2010): 308。从古代中国文本角度对作者身份进行的一般性反思,亦见 Christian Schwermann, “Composite Authorship in Western Zhōu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Case of the ‘Tiānwáng guī’ 天亡簋 Inscription,” in Christian Schwermann and Raji C. Steineck, eds., *That Wonderful Composite Called Author: Authorship in East Asian Literatures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14), pp.30–57, 特别是页 37–42。

^⑩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英文版: Liu Xiaogan, *Classifying the Zhuangzi Chapter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⑪ Klein, “Were There ‘Inner Chap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p.306–307, 356–357, 360–361。

是间接借自《庄子》,这些情况皆非绝不可能。虽则“证据不存在,并不就是不存在的证据”,朴仙镜的主要贡献,是令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早期《庄子》文本作者与结构的传统信念”^{②0}。至少就我对她作品的解读(可能不完全符合她自己的解读),朴仙镜的研究带给我们的,是考虑周全后提出的质疑,而非另一种确定的观点。

刘笑敢近期编纂的《道的道家哲学指南》厚达 550 页,第二部分的主题即是《庄子》(页 129—237)。这个部分共四章,两章由刘笑敢独立撰写,一章由他与其他学者合著。其中只有一条注释直接转述和讨论朴仙镜的论文^{②1}。刘笑敢只用了一个注释提及朴仙镜的研究,或许已算十分慷慨。他对朴仙镜(及类似)观点的处理——包括将朴仙镜归属某些理论(见下文第 1 小节),以及对纯粹事实重要性的坚持(见下文第 2 小节)——可能反映了由理论而导致的目盲,以及情绪上的排拒。

1. 第五种理论

“知出乎争”层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构想假说或理论。刘笑敢在数个理论互相抗衡的脉络中,简单讨论朴文。他将以往的《庄子》研究整理为四种理论,又描绘了一个晚近浮现的“第五种理论”。“第五种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即是违反了“一般认为《庄子》由庄子所撰,且《庄子》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与著作之假定”。刘笑敢猜想:“朴仙镜似乎支持这种理论,认为《内篇》是《庄子》核心和最早部分的传统立场,可能完全不对;那些篇章可能经由汉代编纂者所挑选。”因此,“如果《庄子》最初仅是由卷帙汇编成册而非单一著作,我们今天所见的《庄子》便可能和庄子这个人完全无关”^{②2}。至此,刘笑敢对朴仙镜初步意见的呈现,是甚为准确的。

但当刘笑敢开始给朴仙镜的质疑贴上诸如“无特定作者理论”(“No Specific Author theory”)和“任一时间成书理论”(“Any Time

^{②0} Klein, “Were There ‘Inner Chap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p.299, 354.

^{②1} Liu Xiaogan, ed., *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 (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 6) (Dordrecht/Heidelberg/New York/London: Springer, 2015), p.131, n1.

^{②2} 同前注,页 131。